

13.58
V

龙岩文史资料

119
第 四 期

4. 10. 1.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龙岩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龙岩文史资料

第四期

一九八二年四月

编辑：龙岩文史征委会编撰组

出版：政协龙岩市委员会

印刷：龙岩地区印刷厂

目 录

陈明烈士传略.....陈仙海 (1)

邓子恢传.....蒋伯英 邱林忠 邓芳梅 黄祖洪 (11)

毛泽东、朱德同志创建“闽西红军学校”.....林定煌 (36)

闽西红军医院.....邱林忠 (39)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组织名单.....郑学秋 (47)

三战新祠.....姜茂生 (郑学秋整理) (48)

龙岩教育界的抗日救亡活动.....郭 翔 陈仙海 (54)

龙岩卷烟业的发展.....郭 杰 (59)

英烈谱 李联星 罗怀盛 陈国华 谢宝萱 郭义海

郭达章 吴义煌 张群初 陈义辉 郭 香

..... (李伟夫、黄阁辉、郭深圳、陈仙海、张汉城、郭翔整理) (66)

地方人物志

(元克中 陈 麟 饶廷襄 郭 铉 郭 炼)

.....郭义山 (78)

(内部资料)

陈明烈士传略

陈仙海



陈明同志，乳名玉辉，学名若星，字少微。一九〇二年三月生于福建龙岩东肖区龙聚村一个农民家庭里。父亲陈庭佐，是忠厚勤朴的农民，以耕田为主，农闲做米粉加工赶圩集摆面粉摊，勉强维持家庭生计。陈明有弟妹共十人，他为老大，虽家口众多，经济困难，他父亲还是节衣缩食让他上学。陈明少年时在东肖桐岗小学读书，一九一七年升入龙岩九中。因家境贫困，弟妹又多，家务繁重，他每天课余回家，帮助母亲操劳家务外，还要参加田间劳动，每逢圩日，又要跟随父亲去赶集，协助做买卖。劳动虽然繁重，但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深为老师、同学爱慕。他从小目睹农村政治腐败、经济凋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惨景，心里郁闷，立志要革除弊政，改造社会，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暴发，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很快传播到闽西各地，此时，陈明正在龙岩九中读书，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启发。一九二一年他在白土桐岗小学教书时，就与邓子恢、林仙亭、章笃奇、林岳、张余生（以后叛变）等人发起组织“奇山书社”，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集资购买许多新书和报刊，如《新潮》、《新青年》、《向导周报》、《共产党宣言》等，进行阅读研究，旨在“先从改造个人做起，而后及于改造社会，起而互助合作”。他们在这个宗旨下，不久便办了一个油印小刊物，发表大家的学习心得体会，互相促

进。通过学习研究，陈明同志进一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知道国家的落后，人民的贫穷，绝不是那些豪绅地主们所说的什么命中注定，

“八字”不好，而是受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北洋军阀剥削压榨的结果，要拯救中国，改造社会，振兴中华，就必须彻底地揭露这个旧社会的黑暗，唤醒民众，革除弊政。于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他们在“奇山书社”的基础上，发起创办《岩声报》，公开向旧世界宣战，宣传新思潮，提倡新文化，报导群众的斗争。《岩声报》前后办了三年多，共出版了四十多期，它除在国内的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湖北、上海、台湾等十二省的三十五个县市发行外，还远销至海外的新加坡、印尼等地，影响颇大。陈明是该报的主笔和主要撰稿人，开始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庶务干事，为该报经费的筹集、印刷与发行，到处奔波，熬尽心血，特别是他以笔代枪，写了许多文章，勇敢地向旧势力宣战。他在《岩声报》上发表的《催夫的一幕》、《狗世界》、《为党军入闽告我岩父老兄弟》等文章，都是他锋芒初露，才华横溢的好作品。再如他在一篇《争回我们的自由之路》的诗中写道：……

然而不斗而生，不若斗而死，
奋身伐贼，虽死犹荣；
虽然失去了我们生活的资料，
却得到我们生命的源泉；
努力呀！奋斗呀！
守此生命的源泉，
坚持到底，发挥光大；
反抗一切的民贼，一切的强权，
争回我们的自由之路。

诗歌充满了豪情壮志，是一篇向反动派宣战的檄文。但正当陈明向社会大声疾呼的时候，父母亲却怕他惹是生非，远走高飞，要他提早与童养媳结婚，守在家中，生男育女。在那封建旧礼教思想还很浓厚的年代里，违反父母之命是要受到族规家法的惩罚和乡亲们的责怪

的，而女方也年少俊俏，聪明贤惠，勤劳朴实，很受父母及弟妹邻舍们的称许，这对一般青年人来说就更具有强烈的魅力。然而，陈明却与众不同，他认识到过早结婚，就等于在自己身上多一条羁绊，缠住手足，不能更好冲向社会，为国为民出力，况且今日国家政治腐败，内乱外祸，国弱民穷，正需要一批有志青年起来努力奋斗，勇于牺牲。于是，他不屈于旧习惯的压力，不畏世俗偏见的责难，而坚决反对，并耐心地说服父母和族亲，同时又多次请亲友向女方和女方家长说明道理，表明态度，要立志革命，改造社会，劝导她及早另行选配，免误青春。经过反复做工作，终于他们都同意了，陈明高兴地对同事们说：“这是我向封建旧礼教斗争的胜利。”

翌年春，因工作需要，陈明离开了桐岗小学，到南安斗南中学教书，后又到厦门集美和中山中学任教，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我省较早入团人之一，并在该校与阮山、李觉民等同志一起进行秘密革命活动。还兼任《江声》、《岩声》报记者，经常向该报写稿，报导厦门及闽南各地人民向旧势力作斗争、开展工运、学运等情况，继续宣传新文化运动。为了进一步寻找革命真理，了解马列主义，一九二五年秋经友人介绍，到上海大学社会系半工半读。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进一步耳闻目睹了广大工人、市民在三座大山压榨下的悲惨景状，更加激起他对剥削阶级的憎恨与反抗。上海大学名誉上是国民党所办，但校务和教学工作都是由著名的共产党员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等人主持。瞿秋白同志还曾任过该校社会系主任，这就使陈明更有机会接触了解马列主义，促使他的思想更快进步。不久，陈明便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是闽西最早的党员），参加学校地下党的秘密斗争。

一九二六年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帮助下，广州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形成了国共合作，誓师北伐。此时，陈明受党的委派来到广州，在北伐东路军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在东路军向福建进军途中，他积极参加起草和印发《告福建工友书》等宣传品，沿途号召广

大工农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支援北伐，打倒北洋军阀、打倒烈强、实行国民革命。同年冬东路北伐军占领福州后，他受党的委派，任国民党（左派）福建省党部宣传部长，兼福建《评论社》社长和《国民日报》主编，继续抨击北洋军阀，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组织国民革命政府，巩固、发展、壮大统一战线力量，同时还与徐深等积极协助福州特委开展工作。一九二七年春，因工作需要调往厦门、龙海等地，从事工农运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 福州发生了“四·三”反革命政变。一时到处屠杀、逮捕、通缉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的“清党”反共暴行，象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闽江两岸及闽南、闽西等地。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八闽大地，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共福州市委书记徐深，厦门市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副委员长杨世宁（龙岩万安人），上杭县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林心尧、张楷等优秀共产党员及不少工农运动骨干惨遭杀害，各地工、农会被解散，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通缉。陈明当时正好在农村，未遭毒手，但被列为首犯，到处张榜通缉追捕。陈明眼看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感到无比悲愤。正在革命处于危急的关键时刻，一天，他获悉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正在武汉开会，如同黑夜飘泊在汪洋大海中的航船见到灯塔一样，心里豁然亮开。陈明在广州时就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知道他们是我党的杰出领导人，现在只有找到他们，革命才有方向，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他不顾个人生命危险，立即化装成教员，机智勇敢地排除了特务暗探的跟踪追捕，巧妙地避过了重重哨卡的检查，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武汉，找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大革命失败后福建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给他详尽地阐述了国内外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并让他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写的这篇光辉著作，象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也照亮了陈明同志的心，使他提高了革命勇气，增强了信

心。七月初，周恩来同志亲自委派陈明同志为中共中央福建省党务特派员，并令他立即赶回福建，整顿和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领导人民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继续开展工农运动。七月底，当陈明和谢汉秋（龙岩适中人，曾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等职，一九三〇年病故于厦门）秘密回到福建时，白色恐怖仍十分严重，有的同志被杀了，有的同志失踪了，有的同志则隐蔽起来或被驱逐到海外去，福州、厦门及闽南一带情况更为严重，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陈明却毫不灰心，也不畏艰难险阻。他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深入农村、工厂、街道、学校及渔船港口，找同志们谈心，向他们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指示，阐明当前的革命形势，介绍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今后革命斗争的方向和策略，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鼓励大家树立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强信念。在陈明、陈昭礼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不久，便重建起了闽南、闽北两个特委，陈明任闽南特委书记（包括闽西各县）。此时，正是“八一”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率领起义部队南下入闽。陈明从报上得悉此消息，非常高兴，立即在厦门秘密组织“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并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乘这个有利时机，大力宣传“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意义，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迎接起义部队来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与此同时，又派特委委员罗明同志日夜兼程，赶赴闽西各地组织响应，并向周恩来等同志汇报请示工作，事后又派专人送去“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九月间，起义部队从赣南入长汀，经上杭转往广东时，他们沿途发动群众，宣传“八七”会议精神，布置武装暴动，并还拨了一批枪支、弹药，给各地工农武装，大大地推动了我省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

十月间，陈明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党中央命令他负责召集福建各地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健全

和加强福建党的领导。陈明回闽后，根据中共中央十月十五日来信精神，在厦门召集闽南、闽北临委及各县党负责人会议，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陈明被推选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负责整个联席会议的筹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十二月四日，在漳州召开了闽南、闽北临委委员和各县委负责同志联席会议，陈明作为大会主席团三个执行主席之一，主持了大会。他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指示及我省的具体情况，向大会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政治任务》的报告，认真地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和策略。到会同志认真地讨论了目前政治任务、组织、宣传、军运、工运、农运、妇运、CY（共青团）组织和武装暴动等十二个问题，并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确定了党当前的斗争任务与策略，明确地提出了“在农村应该由抗捐抗税，进而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在这次会议上陈明被选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第一任福建省委书记），陈昭礼为组织委员、王海萍为宣传委员，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会议结束后，陈明根据联席会议精神，与省委其他同志进一步分析了全省的政治形势，提出一面继续整顿和恢复各级党组织，发展工农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加强对基层工农运动的领导；一面派出干部深入各地，进一步宣传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伟大意义。到十二月底，在陈明和其他临时省委，各级基层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努力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进展很快，全省又恢复和建立了福州、厦门两个市委，龙岩、永定、平和、建瓯、漳州五个县委，武平、南靖、仙游、德化四个特支，党员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一千人左右；共青团员发展到二百余人，把全省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被打散摧垮的党、团组织恢复、发展、健全起来。在福州、厦门、闽北及闽南沿海等地，因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就先发动工农群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减租减息和反对苛捐杂税等斗争，进一步健全和扩

大秘密农会、工会，努力争取群众。在闽西，由于党和群众运动基础较好，领导干部较强，反动统治力量较薄弱，则应积极发动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一九二八年春夏间，龙岩、平和、上杭、永定等地农民，在省委的领导下，在罗怀盛、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郭伯屏、傅柏翠等人的领导下，都相继举行了武装暴动，烧毁田契借约，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揭开了我省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农民武装暴动序幕，为一九二九年毛泽东、朱德及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入闽，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九二八年一月间，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执委会议时，陈明认为罗明对全省的情况，尤其是闽西各地的农民运动情况较熟悉，经验也较丰富，于是，他主动向大会提出，由罗明来担任省委书记较适合。后经省委讨论通过，呈报中央批准，他改任宣传部长。陈明这种实事求是，毫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时刻以革命事业为重，能上能下，尊贤让能的崇高思想品德，是极其可贵的。同年三月间，罗明去莫斯科参加“六大”时，省委书记仍由陈明代理。

革命道路并不平坦，正当全省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时刻，混进革命队伍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陈祖康、张余生突然投敌叛变。他们曾在漳浦、漳州等地工作过，陈明同志生怕这些地方党组织遭受破坏，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并亲自前往布置同志们安全转移，尔后到漳州时不幸被敌人捕去。

敌军师长张贞知道他是我省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获至宝，欢喜若狂，马上暗中派叛徒张余生来劝降。张余生原是陈明同志的同乡，又是同事，他们曾在一起组织“奇山书社”，出版《岩声报》，可是，革命洪流中泥沙俱下，沉渣泛起，当革命处于低潮时，张余生经不起考验叛变了革命，投靠了张贞。他每次来探狱时，总是假惺惺地带些饼干、水果之类，以同乡旧同事关系，企图笼络感情，消磨陈明同志的革命意志。陈明对此十分气愤，恨不得当面痛斥他一顿，但

又考虑到可利用他的关系，周旋逃脱，便将计就计，表面应付，以身体不好和看报纸为借口，要他设法转移到一个较安静偏僻地方。张余生不知是计，以为陈明回心转意，便把他转移到市郊一所较安静的平屋里关着。一天晚上，陈明同志趁着看守的匪兵睡去时，用蜡烛火烧焦了屋顶的角板，扒开瓦片，从屋顶逃了出来，在漳州黄时甫律师（龙岩人）家藏了数天，后又乘船到厦门住在一位朋友家里，经石码联络站和黄泉萍等人的帮助（黄系国民党左派，北伐时的同事），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经省委报党中央批准，派他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

一九三一年冬，陈明同志回国后，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任教官，从事党的理论教学工作。一九三二年春夏间，为了准备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开辟闽南革命根据地，筹集经费和医药等军用物资，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三军团主力东征漳州，因陈明同志是福建人，又在漳州一带工作过，地形情况较熟悉，故被调来随军东征，做向导和宣传鼓动工作。陈明同志一路上除给前头部队介绍各地情况，找当地党组织了解敌人的军事情报外，还经常用闽西、闽南的地方方言，编了许多山歌，画了宣传画，向沿途群众宣传此次红军东征的重要意义，发动群众，支援红军。东征队伍到达龙岩时他没有回家，而是连夜赶画了两幅宣传画，并写上山歌，贴在龙岩县苏维埃政府门口，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支援红军消灭张贞匪军。

同年四月二十日红军攻入漳州至六月八日全部撤出，在这短短的四十来天中，陈明同志到处奔走，为发动群众打土豪，烧田契，分土地，分浮财，废除苛捐杂税，开仓济贫，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红军和闽南党组织及人民群众的好评。

同年六月中旬陈明随军回到中央苏区后，仍在红军学校工作，为了能理论联系实际，曾几次到江西的于都、会昌、兴国及福建的长汀等地作社会调查，充实教学内容。一九三二年冬十九路军占领龙岩后，他父母亲都避难到长汀、瑞金一带。龙岩互济会张龙地等同志为了照顾他父母亲的生活，曾多次建议他父母亲到红军学校去住，但陈明同志

却不同意，并耐心说服了双亲，叫他们仍住在互济会难民处，跟大家一起生活，同甘共苦，陈明同志这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不搞任何特权的优良作风，深受大家的赞扬。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导致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逼长征，陈明同志也随军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他一直在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中任干部团政委，致力于红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勇于向“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他不顾长途行军作战的疲劳，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编写许多通俗易懂的诗歌和宣传品，向沿途群众宣传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特别是坚持党的民族政策，耐心细致地做少数民族的思想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明同志被任为八路军随营军事学校校长，后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出发前线抗日，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和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参加抗战。当部队到达山东后，党为了加强抗日地方武装的领导，又调他出任远南支队政委，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一九三八年冬，为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民主政权，陈明又被调去任中共山东分局党校校长，培养训练干部，提高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和执行政策水平。一九三九年春，沂水二区召开民主选举大会时，陈明作为党校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向大会作了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和《人民应当怎样爱护民主政府》的报告。他那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热情洋溢的演讲，给大家的教育启发很大，感受很深。由于他工作一贯认真负责，深入细致，联系群众，于同年夏山东省民主选举时，他被选为省临时参议会委员，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战时工作委员会干部少，工作多，任务重，委员分散，许多方针政策还要在摸索中制定。陈明以旺盛的斗志，白天奔跑各个战地，一面了解情况，帮助各战地解决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一面作实际调查，总结经验，为制定各项政

策法令提供依据。晚上回到机关，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外，还要起草各种文件，往往忙至深夜一、二点钟。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和战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在陈明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成绩显著，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空前巩固和壮大，成为日伪军侵华的大障碍，他们把它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连续组织几次大扫荡，妄图摧毁山东抗日民主政府，扑灭抗日火种，但山东全体军民齐心协力，一次又一次地给日伪以迎头痛击。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万恶的日伪军又对山东解放区再次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陈明在率领全体干部和群众在反“扫荡”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时年三十九岁，实现了他生前亲笔写下的“奋身伐贼，虽死犹荣”的壮丽誓言。

陈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福建省早期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艰难险阻，南征北战，十几年如一日，勤勤恳恳，赤胆忠心，致力于党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无私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陈明同志永垂不朽！

邓子恢传(连载)

蒋伯英 邱林忠 邓芳梅 黄祖洪

(十四) 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一九三八年三月，邓子恢和张鼎丞、谭震林率领新四军二支队，肩负着中华民族的重任，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闽西，不畏艰险，奔赴抗日战场，经赣州、吉安，到达南昌。

邓子恢在南昌见到了叶挺、陈毅、项英、周子昆等久经患难的战友，感到无比兴奋。过了几天，在新成立的南昌军部召开了欢迎大会，邓子恢满怀抗日的激情发表演说：“现在的抗日高潮是两大革命巨流汇合而成的，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北上，一是全国各大城市工人、学生的抗日运动……”①刚要讲下去，忽然项英示意制止他再讲。原来是项英怕讲了共产党领导抗日会引起国民党方面的不满。邓子恢对项英这种惧怕国民党的右倾情绪感到十分不满。

在南昌住了一个月左右，新四军军部迁到了皖南新安江畔歙县岩寺，在这里建立了江南抗日前线的大本营。到达军部后，邓子恢担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部长，同时兼任东南局的民运工作。

四、五月间，邓子恢因患肺炎，来到了安徽黄山，一边工作，一边休养。四月下旬，军部派遣粟裕率领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进行战略侦察；五月中旬，陈毅也率第一支队向皖南南陵地区开进。当时，邓子恢感到这支由八省红军游击队新编成的抗日部队开入新区，初次与日寇交战，更有必要取得人民群众的了解和支持。他不顾病体未愈，亲自起草了一份布告，经军部批准后，发给开往苏南前线的部队，沿途向人民群众宣传。布告明确地阐明了我军的宗旨、任务、

纪律，以及对待群众的态度，使我军一到抗日前线，就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江南人民大众面前。

为了动员各阶层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战争，邓子恢亲自组织了军部服务团和宣传队，以戏剧、文学、美术、歌咏等等形式来扩大党的影响。一九三八年夏天，他委派民运科长陈茂辉在南陵三里店洪塘村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抗日游击战训练班。受训的学员都是封建遗老遗少，青红帮头目和社会名流。开始，陈茂辉很感纳闷，认为这些人有什么好训练的。邓子恢向他解释说，这班人都是社会实力派，手下有许多门徒，如果把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动员起来了，新四军就可以增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后来，这些受训的“老学员”确实在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当新四军在皖南、皖中集中时，日寇已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徐州、蚌埠等大中城市，而对广大农村则尚未来得及控制。江南地区国民党正规部队早已逃走一空，只有少数县、区的反动政权在那里抽捐派款、收编土匪，压制民众；对抗日救国则漠不关心，见到日军则东逃西躲。因此，地方上土匪横行，不少散兵游勇，各霸一方，自封“司令”，胡作非为。

这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新四军抓紧有利时机，主动深入敌后，“东近江南，直逼京沪，渡江北上，进入华北。”但是项英推行长江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中央指示拖延搪塞。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毛泽东致电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令其克服一切困难，采取灵活战术，组织民众抗日武装，积极开辟抗日根据地，并向南京、上海敌之心脏地区发展。五月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长江局和东南局，催促其利用新四军的战略优势，主动积极地深入京、沪敌后，“大大的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②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项英才勉强执行党中央指示。一九三八年六

月一日，陈毅率领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活动于南京以南广大地区；七月，张鼎丞率领第二支队进至苏南、安徽边界地区，初步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谭震林率领的第三支队也向苏南沪宁线一带挺进，威胁上海。

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新四军军部由岩寺进驻泾县云岭。八月，邓子恢到江南一、二支队活动地区视察，他看到部队战斗频繁，兵员、军饷不足，武器装备又很差，就与陈毅、张鼎丞、粟裕等同志商议，决定就地组织游击队，收缴土匪武装，扩大兵员，并设法征收税款；同时，也罚一些地主的款以补充军费。这一方针，受到了群众和大多数指战员的拥护，部队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了项英、袁国平的批评。甚至有一次邓子恢派民运科干部收编了一股土匪，双方接洽之后准备接受新四军的改编，但项英却拒绝收编，说要让国民党县长去收编。据此，他们指责邓子恢搞的是“人、枪、款”主义，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甚至不准部队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害怕会吓走地主，孤立自己。对项英的这种右倾思想，邓子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新四军宣传部张凯因为支持了邓子恢他们的工作方针，受到了项英的严厉批评，心里很苦闷。邓子恢鼓励他说：“由他们去讲，你不要怕”，他还支持民运部的干部要顶住项英的错误指责，说：“我们是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的，不要怕。……他们批评指责，由我负责，担子归我挑。你们照旧干下去，历史自有公正的结论。”③项英、袁国平他们受长江局王明的影响，过份地迁就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不敢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们不敢在新四军里公开建党，甚至不敢公开承认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连党的军分委会议和党组织活动，也只能偷偷地到山上小茅棚里去开，生怕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知道了，会得罪于国民党。邓子恢对于项、袁这种限制自己、束缚共产党手脚，以至放弃党在统一战线领导地位的做法十分气愤。他作为军政治部副主任和民运部长，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他

每次外出检查工作，总要带上几个宣传员。每到一处，他都亲自召集群众开会，宣传党的主张，号召抗日救国，争取新区群众对党和新四军的同情了解，发动群众投入抗日队伍。邓子恢用他的实际行动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由于项英对执行中央的方针指示一直犹豫不定，对发展敌后斗争缺乏信心，因而一再受到中央的严肃批评。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叶挺军长的陪同下，从重庆绕道桂林到新四军视察工作。

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一行乘船沿着青戈江在章家渡登岸，邓子恢及军部机关全体同志在渡口把周恩来接到了云岭军部。周恩来在军部大礼堂向部队和农会干部作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报告，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对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表示问候和赞扬，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精神，讲解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一文的基本精神。周恩来特别重申了党中央关于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痛斥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谬论。^④并规定了党中央给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邓子恢听了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报告，异常兴奋，他深深钦佩毛泽东同志伟大的战略思想和周恩来同志对时局一针见血的透彻分析，从而也更坚定了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坚持的正确方向。周恩来的报告，对于邓子恢在今后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能够坚定地执行和运用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

（十五）北上淮南，开辟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由鄂豫皖苏区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三千余人，根据党中央东进的战略方针，于十月下旬，先后攻克了淮南路西之